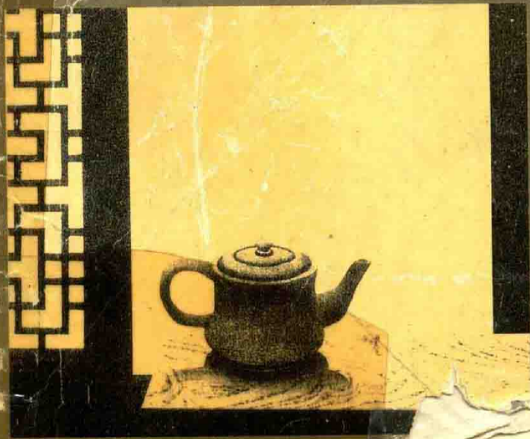


徐州作家文库

闲话徐州



远方出版社

(115)

徐州作家文库

闲话徐州

汉风 著

198302
远方出版社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志忠

封面设计:朱天杰

闲话徐州

(徐州作家文库)

汉 风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徐州地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875 字数:141千字

1996年12月第一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1册

ISBN 7-80595-169-1/I·73 定价:9.80元

自序 序 父汗章文墨卷，侧裁附香新代因景亦奕矣
立降对奕胡典，里同扣的半半候不亦，的隆不慰意舞景仰又内
翔章文泄亥，言面效朴从)“一台三“选左舞荷，自来善舞桂百
由(。品汽交感附香三呈前，学文告琳畔文卷景不出，文嬉景沐
。”对露真米强新，利舞研巨“章文

的舞了到会附然踏个一意因，入批翁随西晒景咨立一言 (12)
不竟，日几丁致，“我舞曾未对一舞商嘉”，文一《诗季批翁眼》
下如与口非奇典，丁舞修批翁米，汽群西晒西一善管，里千云
。交半忘

而且个半 里对与内人全洲五语取字文墨亥，天令匪直 (25)

收在本书中的二十篇文章差不多都在报刊上登载过。这些文字当初面世的时候，曾经引起过一些风波，比如谈到徐州的茶馆和户部山的建筑，文章一见报，便接到“有关方面”的电话，听了几句棉里藏针的话。这情形自然让想起六十年前《闲话扬州》一书引起的文字官司。

六十年前，湖南名士易君左写了一本《闲话扬州》的小书，因书中说到澡堂子中擦背和修脚的大都是扬州人。于是被认为侮辱了扬州人，一些“有心人”一时群情激愤，最后闹到法院，正式打起官司。法庭的裁决是：易君左公开道歉，并且赔偿名誉损失费八百元。

易君左当时官任江苏教育厅主任秘书，这样大的官，官司都输了。我一介书生，无职无权，只是写文章说了几句真话、实话、直话，自是不愿惹来任何是非，更不愿到法庭上吃官司，给创作招来无端的烦恼。好在“有关方面”没再深究下去，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为什么现在要冒着吃官司的可能重新出版这些

这实在是因为读者的鼓励。这些文章刊发之后，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是我意想不到的。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陆续接到近百封读者来信，称我这些“三合一”（从体裁而言，这些文章既不是散文，也不是杂文和报告文学，而是三者的杂交产品。）的文章“写得够味，读起来真痛快”。

有一位客居湘西的徐州人，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读了我的《别徐州老街》一文，“激动得一夜未曾睡好”，过了几日，竟不远千里，背着一包湘西特产，来徐州看我了。现在咱们已成了忘年交。

直到今天，这些文字还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半个月前，我接到家住津浦东路一位姓马的读者的电话。他说，有几位刚从台湾归来的老先生，因怀念旧居，想看看我些的《走近户部山》，并希望与我聊聊天，不知能否如愿。我按照马先生留下的地址把文章寄去了。只是由于工作的变动，至今未接到马先生的复信，那几位老先生是否回台了？徐州市文化局文物科的夏凯晨先生来电话，最近徐州市要把户部山申报为文物保护区，在准备材料的时候，想起了我的文章，邀我面谈了一场。

因为读者们还记得这些文字，并给我热情和鼓励，我便决定重新出版这些文字。我写作有两个原则：一是说真话、实话；二是为大众和读者而写。读者是上帝，既然“上帝”愿读我的文章，至于会不会招来“有关方面”的官司，倒是不以为然了。

丙子年腊月二十四日凌晨

汉风于徐州市彭井涯三余斋

目 录

(281)	帝皇文韵	徐州	徐州
(181)	鲜许曰	徐州	徐州
(139)	都市外	文邑	徐州
评徐州人	
	——也谈“穷山恶水”与“泼妇刁民”.....			(1)
说徐州话				
	——漫谈徐州方言			(12)
听徐州戏				
	——黄河沿儿听戏			(21)
别徐州老街				
	——对徐州民俗载体的反思			(25)
惜徐州老屋				
	——走近户部山			(33)
坐徐州茶馆				
	——徐州茶文化思辨			(46)
吃徐州早点				
	——徐州饮食文化透视之一			(52)
逛徐州夜市				
	——徐州饮食文化透视之二			(58)
话徐州牌坊			(65)
怀徐州儿歌			(70)
观徐州儿戏			(83)
赏徐州花草			(95)
述徐州八景			(100)
寻徐州寺院			(114)
赶徐州庙会			(119)

闲话徐州

论徐州的文皇帝	(125)
逛徐州旧书摊	(131)
逛徐州花鸟文化市场	(139)
访徐州老字号	(145)
附录：考徐州街巷	(179)

(15)	(179)
(18)	(179)
(22)	(179)
(23)	(179)
(24)	(179)
(25)	(179)
(26)	(179)
(27)	(179)
(28)	(179)
(29)	(179)
(30)	(179)
(31)	(179)
(32)	(179)
(33)	(179)
(34)	(179)
(35)	(179)
(36)	(179)
(37)	(179)
(38)	(179)
(39)	(179)
(40)	(179)
(41)	(179)
(42)	(179)
(43)	(179)
(44)	(179)
(45)	(179)
(46)	(179)
(47)	(179)
(48)	(179)
(49)	(179)
(50)	(179)
(51)	(179)
(52)	(179)
(53)	(179)
(54)	(179)
(55)	(179)
(56)	(179)
(57)	(179)
(58)	(179)
(59)	(179)
(60)	(179)
(61)	(179)
(62)	(179)
(63)	(179)
(64)	(179)
(65)	(179)
(66)	(179)
(67)	(179)
(68)	(179)
(69)	(179)
(70)	(179)
(71)	(179)
(72)	(179)
(73)	(179)
(74)	(179)
(75)	(179)
(76)	(179)
(77)	(179)
(78)	(179)
(79)	(179)
(80)	(179)
(81)	(179)
(82)	(179)
(83)	(179)
(84)	(179)
(85)	(179)
(86)	(179)
(87)	(179)
(88)	(179)
(89)	(179)
(90)	(179)
(91)	(179)
(92)	(179)
(93)	(179)
(94)	(179)
(95)	(179)
(96)	(179)
(97)	(179)
(98)	(179)
(99)	(179)
(100)	(179)

评徐州人

——也谈“穷山恶水与泼妇刁民”

前几日，我在《淮海文化报》上编发了一篇题为《“穷山恶水”是谁说？不是乾隆是“奏折”》的文章（见《淮海文化报》总第246期）。文章依据史实和史料阐述了“泼妇刁民”一说的由来，纠正了乾隆皇帝之说的讹传。文章刊发之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位读者来信说：“‘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黑锅已经扣在我们徐州人头上几百年了。这篇文章有如一击重锤，敲碎了这口黑锅。徐州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还有一位读者说：“编发这种具有历史疑点的翻案文章，从中可以看出编者的眼光和良苦用心”。但也有读者对文章提出“遗憾”，认为：“文章作者虽然有一个良好的出发点，但推翻讹传的论据仍然不足。例如，文章最后的归结性论证（即精华之所在）不是直接引用史料，而是源于一位导游的介绍。这明显犯了‘以讹证讹’的忌讳，不能令人信服。”此位读者还发誓，将亲自去淮北，查阅史志，给徐州人一个“真正的说法”。

我们几位编辑的意见也与这位读者相同。记得当时在校对室里，阿倩先生看过校稿之后，曾用调侃的口气说：“‘穷山

恶水’是谁说？乾隆奏折都没说。”并打算以此为题，做一篇读后感的文章。文章后来没有写来，却给大家留下了一场雅笑。

那位称我有“眼光和良苦用心”的读者，对我实在是有点过誉了。因为我编发此文的时候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史争鸣性的文章来刊发的。文章发表后所引起的反响是意料之外的。作为编者，我知道这种文字官司是很难结案的，更何况这种讹言已传了几百年？但因此而引发出来的文艺争鸣却是有益的。

我们再来谈谈徐州人。一谈徐州人，可能就会有仗义的同乡跳起来大骂乾隆之信口雌黄。乾隆皇帝骂徐州人为“泼妇刁民”早已家喻户晓，传至大江南北。我们暂且不谈传言的真伪（上文的讨论现在确无结果）。先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假如当年“泼妇刁民”的脏水不是泼在徐州人头上，而是泼在江南人或者山东人头上，结果会怎样呢？结果会很简单，江南人精明机智，那吴侬软语的文雅形象会使操这种传言的人成为众矢之的；山东人豪气，那“大江东去”的豪爽性格会使这种讹言不攻自破。他们都不会在意这种传言。江南人只管理经营生意，没有时间去纠缠这些“无聊”的事；山东人仍然喝他们的大碗茶，用煎饼卷大葱，抹完了勺子，至多说两个字：“放屁”！

在这方面，徐州人就显得有点小肚鸡肠，对乾隆耿耿于怀。所以“翻案”的文章一刊发，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好象蓄脓已久的疮疤一下子被戳破了，虽然再碰又疼了点，但终究是放了脓血，以后可以轻松了。这样，拍掌欢呼的有；“扬眉吐气”的有。

如果我再问：“徐州人到底是不是‘泼妇刁民’？为什么这种黑帽子不戴在江南人或山东人头上，而偏偏戴在徐州人头上？”就怕很多徐州人会双唇打并。假使，我说我同意徐州人是

“泼妇刁民”的说法，可能会遭到许多人的谩骂。那么我姑且说一句：徐州人在某种程度和某些方面确实是“泼妇刁民”（请注意：我说的是某种程度和某些方面）。史料我们暂且不查，不妨看一看徐州人生活中的表现。徐州人生活习惯对“泼妇刁民”的诠释可以概括为三个字“脏、乱、差。”

徐州人的脏

徐州人不讲卫生是有目共睹的。“男人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这是以前徐州人常说的话。上了年纪的徐州人可以回忆起前些年，一些蓬头垢面，身着空壳袄，腰扎破草绳的徐州乡下汉子的形象。现在乡下人比以前富了，破棉袄也不多见了，但骨子里的习惯却没有多大改观。不信，你可去乡下做个统计，看看一个人一年平均洗多少次澡，多长时间换洗一次衣服。有些夏衣穿得时间过长，汗迹斑斑，形如地图；还有些人，冬衣穿久了，领口过脏，翻过来再穿，也不愿脱掉清洗。乡下人有了点钱，不惜倾家去盖宽敞的瓦屋或楼房，却不愿花几十元钱去改善厕所的卫生条件。乡下厕所现在还多是露天的，放几块石块或砖头作为便池。一到夏天，苍蝇乱飞；若遇雨季，便水横流，更是不忍卒睹。以前乡下条件简陋，冬天洗脸常用土烧的凹腰泥罐，放在锅底下做饭后的余火上温热。一家人同用一条毛巾，同用那半罐珍贵的热水。他们洗脸，从来不用肥皂。今年春天，我去沛县出差，在半途上碰到两个上车的男学生，脸蛋儿看上去又嫩又白，但脖子上已是灰迹斑斑。他们可是受了教育的高中的学生啊！

城里人的情况，表面上看起来比乡下人好一些，其实也糟得要命。不符合卫生条件的街头早点铺和露天夜市大排档，每天门庭若市。徐州人有句俗语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吃早点

的必要几瓣大蒜，名曰“大蒜消毒”。这真有点掩耳盗铃的滑稽，因为大蒜上留有蒜皮的污垢或者未经过滤的冷水，会不会增加病菌还说不准呢！我做记者采访的时候，曾有意注意过徐州中、小饭店的熟菜加工间，每次出来，食欲殆尽。说出来会让你吐舌三日，你自己也可去体察一下，不要多，一、两家就行了。大部分的加工间凌乱不堪，怪味扑鼻，地面上污水片片，有时候擦污水的拖把还靠在门后呢！再看墙上，白瓷砖变成了黑瓷砖，排气扇四周，烟油欲滴。若在米线馆一类的小吃铺，盛余物的垃圾桶可能就放在门口，脏物四溢，苍蝇乱飞。1995年，徐州市创建卫生城的时候，一次性关闭中、小饭店在千家以上，这足以说明了饭店的卫生状况。

不知你注意过街上去饭店拉剩菜的车子没有。那放在车厢里的塑料桶污水外溢，脏得你须臾掩面。更有那拉粪便的车子，常常没有上盖，臭气熏天。我在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位四川同学曾在街上对着这种粪车大发牢骚，嘲笑我们徐州人不懂卫生，羞得我无言以对。

还有一些人只讲个人卫生，不讲家庭卫生；或者只讲家庭卫生，不讲社会卫生，暴露出一种做人的虚伪和市民的小市侩气。我有一位朋友，是某公司的经理，统率着几百号人。每天在上班时，见他西装革履，油头粉面，领带毕挺；办公室里被他的秘书打扫得一尘不染，好象有洁癖。某日，有闲造访他的府上，没料到开了一次眼界。房间里家什凌乱，脱下的衣服堆在沙发上，桌子上的碗筷好象已堆放了几日，门后盛废纸的垃圾筐纸满为患。更让人难以直视的是，卧室里靠墙的床头绒布罩已被头发擦得油腻斑斑。这种生活小节损害了我对这位朋友的好印象。

这种现象反映出的是做人的虚伪，而那些只讲家庭卫生不顾他人卫生的人则显得更可恨些。住楼房的人，从楼上向下泼水、吐痰、扔杂物的有；住大杂院的人，为了少走几步路，把垃圾倒在垃圾箱外面的有；把污水泼在门前的有；更有甚者门内清爽干净，门外龌龊不堪，掩起门来做人，走出门外是鬼。

徐州人的脏不仅表现在环境卫生上，也表现在语言卫生上，这就是说脏话骂人。说到骂人，乡下的“泼妇”和城里的“刁民”最具代表性。徐州地方戏里有两出表现泼妇形象的戏：《王婆骂鸡》与《懒老婆赶会》。去年冬天，我在黄河沿儿的临时戏棚子里听过前一出。那王婆男扮女装，但扮相逼真，腔调形象，骂起人来，言成套路，押韵合辙，连环而发，一口气骂上半个小时而句无重复。骂人的时候伴着动作，时而指天点地；时而跳跃拊掌；时而甩手顿足；时而坐地击节。把泼妇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把观众骂得一身虚汗。在乡下，每个村几乎都能找到几个这样“惹不起”的人。我就曾看到过因吃了亏从村东骂到村西、来回几趟，不住口诅咒半天的妇人。徐州人骂人的狠毒，全世界都无与伦比。小到个人，大到全家；左涉七姑八姨，右及婶娘舅妈；上溯祖孙八代甚至万代，下追断子绝孙，只要与对方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无一漏网。如果有人居心索录，亲身实践，再写成一本《泼妇之骂》的小册子，我敢保证，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不成问题。

城里的“刁民”与农村“泼妇”比较起来，其“泼”的程度要逊色得多。但七尺男儿，满口脏话，也让堂堂正正的徐州人脸上无光。城里年轻的男子，特别是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多有骂人的口头禅，谈起话来几乎一句一个“妈”字。真是“妈”不离口。鲁迅先生曾经称之为国骂。如果此可称为传统的话，徐州

人是该受到表扬的，只可惜这是一种毒菌，在徐州一直有生存的空间。有一次，我在中山堂剧场里看文艺演出，身边有两个小青年闲话，10分钟的时间，就听到百余个带“妈”的脏字。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随口就来的脏话已蔓延到中、小学校。你走在学校门口或大街上，随时可以听到稚气未泯的骂人口头禅，徐州人若再不加以重视，长此以往，人将不人（仁）了！

日前，徐州市正在加紧进行国家级卫生城市的建设。但如果仅仅注重街面上的卫生，而不从根本上改变市民的素质，促进市民传统习惯和语言行为的卫生，那么卫生城建设仅仅是“走过场”、表面化、形式化运动；那么卫生城的称号会名不符实。

徐州人的“乱”

我们再来谈谈徐州人的“乱”。所谓“乱”就是不守常规。徐州人的乱首先表现在建筑物的秩序上。七十年代以前的徐州城几乎没有几条正南正北或者正东正西的街巷。要么斜成东南西北，东北西南；要么曲里拐弯，不知所向。许多有名的老街很难说清它的走向，如中山南路、民主路、大马路、河清路、永康路、大庆路；博爱街、西阁街、夹河前街、少华街。在巷子之中，乱得最有趣的是回马巷。据《同治·徐州府志》载，此处原名“监巷”，后由于道路迂回曲折，故称回马巷。民间传说，明太祖朱元璋骑马巡视到此，因巷子曲折，找不到出口，回马而去，因此得名。一条巷子乱到连堂堂的皇帝都找不到出口，恐怕又可以创一个世界纪录。

近几年，徐州市的市政建设在飞速发展，新起的路街比以前平直、宽敞多了，但居民区的建筑仍然有些凌乱。最典型的是黄河新村，你若到黄河新村去找人，即便你拿着楼号，非转

三圈五圈不能落实。一幢楼有的可有二、三个序号；二、三个楼偶尔使用同一个序号，真是莫名其妙。有一次，我去黄河新村一位朋友家作客。我请问他家的楼号和单元号，他说“算了吧，给你讲你也找不到，不如6点在医学院门口等我。”看来他是被自己的朋友埋怨多了，才出此下策。

徐州市民的私人住房也乱得够呛。一个大院内，你搭我盖，凸一片，凹一片，把路挤成了单人道。就这窄得不能再窄的单人道两边还挤着破旧不用的各自的家什。徐州本地人常用一个名词来概括这些特征——大杂院。从这一个“杂”字上，你可以想见院子里的脏乱情况。在研究徐州城古建筑的过程中，我常到户部山一带走访，那里的老房子保存得相对完善，但在老房子四周，一个个临时小屋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空间，以致于想摄一张完整的老房子照片都不可能。在状元府、崔家大院、念佛堂等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民居群里，临时搭建物就象附属在千年古树上的一个个肿瘤，使人目不忍睹。

乡下的建筑更是乱得一塌糊涂。地盘是自己的，谁想怎么盖，便怎么盖。潜意识里把房子当作衡量一个家庭经济水平的重要标准。有钱的人家把房子修得又高又大，鹤立鸡群；中等人家修平房；穷困一些的只修瓦房。八十年代以后，有些乡村统一规划，出现了“排房”，情况稍有好转。

徐州人的乱，除了表现在建筑和生活习惯上以外，还表现在非礼貌用语上。我们经常听到长辈对晚辈、或者年龄大的对年龄轻的人说：“你给我乱吧！”这个“乱”字就是对对方不懂礼貌言谈的意见。在乡下，非本族的叔侄辈常互相乱骂，这种乱骂不但不被视为“不恭”，而且还被看作是密切关系的一种方式。城里人因邻里关系比较疏远，论资排辈的机会较少，同龄

人几乎都是兄弟(姐妹)相称,乱骂常改为对骂。

徐州人还喜欢群乱,就是方言所说的“起哄”。起哄不是动手伤人,而是动口作乱。好事坏事,一人先吆,群哄而起,常常使主事者尴尬难当,伤了人的自尊心。起哄的行为多少反映出一个人“落井下石”的可恶心理。走得深了,什么样的“哄”都能随着起。1994年秋,徐州市古彭广场发生的部分市民轰抢菊花事件,可以看作是“起哄”的深层结果。

徐州人的“差”

提起“轰抢菊花”事件,所有的徐州人都会觉得脸上无光。这就批到了徐州人的另一个缺点“差”。差就是“差劲”,包括了自私自利、刁钻古怪、无事生非等许多不道德行为。

在徐州四周流传着一句俗语,“刁徐州滑宿迁”。徐州方言中也有“憨脸刁”之说。“刁”就是刁钻古怪,投机钻营。传言中的“泼妇刁民”实有此意。徐州人不学山东人的直来直往,也不学江南人的精明细致,而是取二者之长,精明过度,形成一种刁钻的性格。比如买卖东西,山东人言出不二,江南人斤斤计较。徐州人则不一样:卖主漫天要价,虚晃一招;买主拦腰砍价,胡搅蛮缠。记得我1990年刚来徐州读书时,有一次去地下商场买上衣。一摊主开价100元,我说太贵。摊主抖起衣服,连珠炮似地发了一通宣传:面料之好、做工之细、样式之合身、进价之昂贵、摊位费之多、看摊之辛苦,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全都说了出来,好象我要拿了那衣服,不赚钱,白交了朋友。我迟疑不决,他说:“你看能给多少钱?”我咬了咬牙,还价70元。他问“还能加吗?”“不能!”“不能也拿走”。把衣服拿回来一问,同室友上个周日以40元得了同样的一件。我真有点哭笑不得。

如果说卖服饰的人耍些花招,价起龙蛇,令人反感的话,

卖瓜果蔬菜的小商小贩就让人痛恨了。他们刁钻的手法更加狠毒。小商贩们一般都有三招：一是虚设价格；二是短斤少两；三是以次充好。徐州电视台《社会大观》栏目曾经曝光过一些个体小商贩用空心秤害人；在鸡身上打水；在鸡鸭屁股里填沙子的不法行为。市民百姓被坑害得久了，都学了一套应付的方法。买菜买菜农的，不买商贩的；随手带一个弹簧秤估计有短斤少两行为，当场验证。

徐州人的“差”还表现在不爱护公共设施和公共卫生方面。上面提到徐州人只讲个人卫生而无视公共卫生。八十年代中期，市政府为提倡市民讲卫生，在淮海路等几条主要干道设置了一些痰盂，结果怎么样呢？痰盂处成了痰的聚居地。直到今天，所有的人还可以在大街小巷上随地吐痰，而无人过问。在此前后，市邮电局曾在市内安置过一些公用电话亭，但不到一年，统统被毁停用。1994年，市政府又在市区中山路等几条主要干道设置了铁皮垃圾箱，但半年不过便体无完肤。垃圾箱被砸的砸，盗的盗，不知何处去矣。

上面所述的徐州人的缺点仅是一概而论，并不代表所有的徐州人都如此。徐州人当然也有优点。

徐州人的豪爽

徐州人的优点首先表现在豪爽上。徐州人常常把自己看作是北方人，而且在外地，常常以刘邦的“大风起兮”来标榜自己的豪气。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感谢丰、沛的父老乡亲。说得确切一点，是他们的豪爽代表了徐州人。徐州人“其气宽舒，禀性安徐”（《太康地记》）；而丰、沛人才“风俗劲悍，有霸王之遗风”。丰、沛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且热情好客。客人进门，不醉不得以归。丰、沛人卖东西，喊价不拖声，不拐弯，只一

句“青菜伍毛”，短促有力，却又直刺耳膜。这一点特别象卖辣姜的山东人。

丰、沛人的豪气传到徐州，多少带了一点怪味。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某日，我在办公室里静坐，听门外有人大喊：“老杨，你个龟孙羔子还没死啊！”“没那么容易，过几天还要娶媳妇呢！”诧异间，二人已进得门来。原来是同单位退休的两个老头在打招呼。这招呼打得真有几分豪气。

徐州人的勤俭

徐州人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能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在这一点上乡下人和中老年人更甚。徐州人过春节，常贴这样的春联，“勤是传家宝，俭是聚宝盆”、“勤俭人家先致富，向阳花木早迎春”。勤俭被当作一种美德。

乡下人干农活讲勤，过日子讲俭；上升到思想角度来说就是“多奉献，少索取”。（当然这种奉献和索取的对象仅限于自己和家庭）。他们干农活的勤奋和甘愿所受的苦会令任何一个有过亲身体会或耳闻目睹的人感动。苏北地区处在暖温带，每到夏季平均日气温都在 30℃ 以上，城里人坐在房子里的电风扇下都觉得闷热。而此时，地里的庄稼长势正旺，稗子杂草也乘势而起。农人们为保证秋收，只好一复一日地在田间锄草和施肥。锄草要在天气晴、温度高的环境下进行，最好在中午，只有这样才可保证被锄掉的杂草脱离泥土后迅速死亡。在中午的高温下，农人只靠一顶草帽来遮阳；只靠一壶凉开水或冷水来消暑；只用一条搭在肩上的毛巾来擦汗。这种难熬的苦力一般人很难消受得起。有些中年男子，光着脊背在阳光下曝晒惯了，皮肤晒成了古铜色，对紫外线的损害熟视无睹了。遇上抢收抢种的季节，许多人可以整日整夜地劳作。在城里，干体力